

一部透视当代中国外交的著作 ——评《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

雷建锋

进入新世纪后,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给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研究提出了更多的亟待研究和应对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由王逸舟教授和谭秀英女士主编的《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①(以下简称《六十年》)是这些不断探索和思考的学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该书在写作体例、研究视角和史论结合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是我国学者探讨中国外交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

—

《六十年》一书在写作体例上有所创新,兼具外交史、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三方面的专长。目前,国内出版的与中国外交有关的著作大体有三类:一是外交实践者的回忆与感想。^②虽然这类著作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是外交问题研究和外交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但是这些回忆录性质的著作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成果;二是外交研究中的主体,即外交史、外交思想史和外交学的研究。^③这类研究中又以外交史研究为主;三是外交具体问题领域的研究。这类研究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但却体现了当前中国外交研究的新方向。^④

* 雷建锋: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邮编:100037)

①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吕聪敏:《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③ 相关外交专著可参见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224页。

④ 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六十年》以当代中国外交 60 年的历史发展为主线,从不同角度和领域透视和分析了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研究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该书既包括对中国外交 60 年宏观概览和考察,也包括对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背景、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开展多边外交的发展轨迹和特征、中国外交制度发展演变、新中国军事外交的研究、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国际身份的变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影响等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最后,本书还对中国外交学研究和外交学学科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历史性地探索。

《六十年》共八章,分别对中国 60 年外交实践总体性、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作为中国多边外交的主要形式的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历史轨迹、中国外交制度的演变和创新、中国的军事外交、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国际角色的变化引起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演变,以及中国外交学研究 60 年的发展演进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与探讨。总体而言,全书以中国外交 60 年发展的时间顺序为“经线”,又以七个不同问题领域为“纬线”,“经纬”分明、宏观分析与微观考察结合。全书每章不求完整记录中国外交史的全貌,而是将中国外交分成不同侧面进行深度考察。

比较而言,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主要以外交实践的历史发展为线索,记录当代中国外交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外交事件和史实,其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尽最大可能地为读者提供外交实践中各方面最准确的历史记录,为外交学研究提供有案可稽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外交学学科发展的基础。《六十年》对具体外交领域,如军事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等领域的外交实践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考察,也对诸如当代中国外交制度演变、中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多边外交进行了分析。该书体现出主编及各章作者们对以国别为研究中心等的原有方法的反思与超越,以及对当下中国外交实践中问题领域不断扩大的认识。

二

《六十年》一书的研究视角独到,以第四章“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考察”和第六章“民族主义的起落与中国外交”最具特色。

考察与中国外交相伴的外交制度的发展变迁是研究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第四章采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范式,考察了中国外交机构发展演变的原因。^① 作者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国家对社会控制由严密到宽松,必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王逸舟:《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第 28—38 页;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1—185 页;郝雨凡、林苏:《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6—214 页。

然对外交机构、外交决策程序和外交决策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外交及其制度的变化更多的是受到其所代表的政治体系变化的影响,受到国家与社会关系间变动的宏观社会政治环境的塑造。”^①

传统的外交史往往只记述外交事件和事件发生前后的国际背景,较少论及当时国内形势,特别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提出的政治系统与系统环境的分析范式,来自系统环境的社会民众将其需求和愿望通过一定的渠道输入政治系统,系统将这些要求和信息进行处理后形成政策作用于社会,由此形成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如果这个渠道顺利通畅,则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和谐有序。^②外交政策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壮大,公众对外交的关注度日益增强,现代通讯技术也加强了国内外、国内地区之间的联系,中国公民对外交的影响也日益增强,“理论上讲,在今日中国,任何一项具体的外交政策,既可能包容着来自民间的深厚根源和多种需求,同时潜含着受到日益增大的民众制约和社会心理否决的可能。”^③如何将民众对外交的希望和要求反映到外交决策者的视野之内,又如何对民众对外交的要求进行正确引导,将相关信息处理形成科学务实的外交政策无疑是当代中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外交部的发言人制度、领事保护制度、外交部领导与网民的不定期对话制度就是很好的举措。新世纪,“外交制度的设计和创新理应进一步体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切实需要以及社会公众的外交参与,既需要体现作为国际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外交制度的政治权威,也要反映社会阶层的知情权,为国家主权的维护和公民利益的保护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④“在传统上习惯孤立于公众责任之外的外交系统,现在被迫去学习公众的交往技巧。”^⑤“如何使外交制度和机制建设更加适应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需要,是政治精英不断实践和学者们持续研究的新课题。本书第四章对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引起的中国外交制度的变化进行的探索,体现了作者较强的学术洞察力。”

本书第六章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和立场及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并以中苏关系为个案分析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竞争共生关系,进而对改革开放后的国家民族主义与大众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在如下方面提出了作者独到的见解:

1. 关于国际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完全用从建立在国家利

①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85页。

②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③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第157—158页。

④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107页。

⑤ [印度]基尚·拉纳:《双边外交》,罗松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转引自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106页。

益之上的现实主义理念解读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以自己的理念取代历史的逻辑”。^① 国际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之间是一种共生竞争关系。作者认为,“在对外层面上,爱国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大体上是重合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强调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实质上是国际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结合,是阶级范式与国家(民族)范式的妥协与平衡”^②“周恩来曾经论述过,爱国主义需要以国际主义为指导,……但在毛泽东时代,两者的权重并不好测量。”^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曾经历长期的半殖民地的国际境遇,建国初期正值两极格局逐渐形成,东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时期,新中国又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国外交政策必须和经典作家褒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贬斥民族主义的立场一致,同时要坚持爱国主义,维护国家利益(民族主义的内容),这种主导思想必然会反映到中国外交实践中去。

2. 政府话语中的“反对霸权主义”和中国的反霸外交。既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中国国家利益(即爱国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是一对共生竞争关系,那么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致与冲突。事实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日益成为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理论依据,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提出了挑战。如何化解这一对矛盾就成为中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中苏关系破裂后,“特别是中国准备与美国接近以后,反对霸权主义才成为中国外交中的核心词汇,而且其矛头首先对准了苏联,后来又用该词形容美国的某些行为。”^④反对霸权主义解决了中国外交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又要兼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两难困境,是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中国将苏、美等国的某些行为贴上霸权主义的标签,这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主要是国家民族主义的逻辑延伸,它是弱小国家常用的工具。”^⑤作者认为,“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在保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同时,兼顾国家民族主义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政府话语。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面对苏联的威胁,“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处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发生严重冲突时的理论话语和外交实践方式。当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中国国家民族主义“找到了暂时的共同点或结合点”时,爱国主义就成了联系二者的另一外交话语,当二者处于严重冲突之时,“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化解二者矛盾的外交话语。

3.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外交的继承关系。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外交必然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或继承性。作者认为,联系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外交的纽带

①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163—164页。

② 同上书,第164页。

③ 同上书,第165页。

④ 同上书,第168页。

⑤ 同上。

依然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不同的是,国际主义色彩淡化,国际主义上升为对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的关注,国际主义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邓小平时期,中国明确强调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处理对外关系”,“民族主义与新型国际主义的竞争关系逐步形成,与毛泽东时代不一样的是,前者居于主导地位,后者虽然存在于中国外交中,但并没有获得主导地位。”^①

综观《六十年》各章,作者运用国际背景的体系层次并借助国际关系理论框架来透视中国外交的历史变迁,分析严密、概念清晰。与此同时,作者具有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政策研究方法。

三

对任何研究而言,能否获得研究所需的充分的相关文献,是研究能否进行的前提条件;同时,正确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质量和研究的科学结论之获得的保证。《六十年》一书无论是在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还是科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都做出了不懈地努力。

就研究所需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而论,《六十年》虽然研究的是当代中国外交问题,但有很多外交档案尚未解密,加之外交的特殊性,外交决策程序和外交决策过程很难为亲历者以外的人所知。因此,相关研究往往难以获得研究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六十年》以使用二手文献为主,大体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关于当代中国外交文献,包括近现代中国外交史;第二类是学者们对中国外交的不同层面研究的相关成果,包括中文文献和外文文献;第三类是关于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各种报道;第四类则是数据库文献;第五类是中国领导人的著作和政府文件。

就学科性质而言,外交学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根据阿普特的归纳,政治学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大类:即规范方法、结构方法和行为方法。^②除了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③之外,《六十年》一书中某些研究——第六章采用了行为研究方法,将个案研究和变量研究相结合。该研究方法的前提是人类社会说到底个人构成的,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决定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第六章采用行为研究方法,在说明中国外交中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共生竞争”关系时,作者对“人民日报数据库”(1949—2006年)这两个词汇在不同时期使用频率

①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180页。

② 关于三种研究方法的具体内容与不同,请参见D. E. Apter & C. Andrain, "Comparative Government: Developing New Nations," in M. D. Irish, ed., *Political Science: Advance of the Disciplin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pp. 82-102, 转引自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③ 《六十年》一书的第一、二、四、五和七章采用的是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

进行了考察,以说明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中国外交中的“共生竞争”关系。^① 作者认为,为了缓解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矛盾,保持中国外交的社会主义性质,20世纪60年代,中国采用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政府外交话语,以适应新的形势。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作者同样采用了人民日报数据库中的数字,用《人民日报》中该词汇使用频率的变化证明自己的观点。^②

除第六章将个案研究法和变量研究法结合之外,全书各章都采用了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外交的不同方面进行比较论;有些章节又将两个30年的不同阶段的中国外交进行了比较,以透视出中国不同时期外交的继承和发展。

四

如上所述,《六十年》一书具有研究视角独到、资料翔实和科学地运用实证、历史文献等研究方法的显著特点。当然,本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分析者需要将中国外交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来加以考察。各章以改革开放前后分界,“薄古厚今”的色彩非常明显。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外交固然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入的反思,同时也需要将其放置于当时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因而当时中国外交具有鲜明反帝斗争的时代特征。关键是,当代中国外交者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和视野具体地审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变迁,避免陷入当下主义(presentism)的思维或逻辑之中。

其次,研究者需要有机地将理论意识与外交史整合起来。当代中国外交实践需要对以往外交实践中的成功与不足进行有针对性地分析和研究,更需要有对中国外交前瞻性的思考和谋划。外交史研究的潜在目的是为后人提供可以作为借鉴的历史材料,知史以明未来。《六十年》一书是一部夹叙夹议的著作,既有对中国外交六十年的历史叙述,也有对60年外交实践的评论,从研究者使用的文献考察,各章基本上采用了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文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者对外交事件的准确把握和了解。^③

第三,研究者要关注中国外交的连续性与变革性。当代中国外交不仅带有传统中国外交的行为特点,而且当代中国外交的不同历史阶段间的变革性与连续性同时并存。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是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即中国决策者对时代主题、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道路、中国的

①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163、164—165页。

② 同上书,第167页。

③ 此问题并非全书各章都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个别章节上有所表现。

战略选择的认识出现了巨大调整。”^①不仅如此,此次中国外交的调整也是由毛泽东等开辟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道路及对外开放的继承和延续。

《六十年》反映出当前国内中国外交研究的最新研究状况。作者所付出的努力,既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深入发展,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对于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深切悼念方连庆教授

我刊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方连庆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8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方连庆教授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1963年起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和国际关系学院任教,2004年退休。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国际政治系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他恪尽职守、治学严谨、甘于奉献,曾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第12卷)等著作,并一贯关心支持我刊的工作。方连庆教授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方连庆教授千古!

本刊编辑部

^① 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第181页。